

命运的交会

□灯下漫笔 ■卢美松



林若茜图

命运之说由来已久,中国人相信命运说相当普遍,其道理缘于他们对上天(天命)的敬畏和信仰,或认为冥冥之中有造物主对人生进行安排。这是古人基于对自己生死不可知、不自主的神秘意识。其实古人对于人生与天命的关系早有探索,认为天意难测,人事唯有循

天命而为,方保无虞,或可得福。后世儒者将之释为天道、天理,实即自然规律。荀子曰:“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”谓天行的规则不因人事而变更。人的命运系于天道,循于天理方能保全,其优胜者可能有顺遂事业乃至开挂人生。其实命者乃人生之境遇,

运者乃人谋之施为。二者有别,不应混为一谈。南朝文学家范缜在《神灭论》中说:“人之生譬如一树花,同发一枝,俱开一蒂,随风而堕,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,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。”范缜以树花的飘坠比喻人的降生境遇,指出人生出身不由主,其出处落地纯属偶然,这

就是命之所系。芸芸众生,亿兆百姓,出处纷纭复杂,或于山乡农户,或于城市闾巷,或于船上渔家,这就是处所境遇的区别,盖即民间所谓之命。命即是定数,古人称宿命,由“天”不由人;后天的变化有赖人事,全仗人谋人为,所以叫作运;运有迁移、变化之义,故曰事在人为。

笔者亲身体会,自幼出生农家,照理是农民的命,不意后天改命而为文化人。命在农村,我故自小即受农人生活习惯陶冶,作为成人前的历练:清晨起床即开始家务,开启室内门户,放养鸡鸭出笼,举竿出门晒衣;回头扫地抹桌,饭后收拾洗碗。稍长则挑水做饭,照顾弟妹。日常抽空下地、拔草浇菜,节假日挑菜出卖。闲暇随母干农活。自认为做这些是分内事,会自觉安排而不待吩咐。父母也不

过问读书之事,自己也没把读书当回事。可见农家人生命的底色就是家务、农务,是命定的本务,并无分外之想。

到初中则不然,因好读书,且爱看课外书籍,无论文史,饥不择食。农家所缺唯书,而家务、农务充斥,迨无怨言者只有认命,以为那是“天职”。既然命落农家,只能安之若素,自不能与城里同学相比。产生改变命运的想法,应自上高中始。高一以后,一天我

到三保街卖完菜后遇见伯母。她既同情惋惜又鼓励地对我讲:“依松,你高中毕业后有否打算上大学?男儿要有志气,有困难伯父会帮助你。”因了这句话,我产生了“改命”的念头,考虑要跳出“农门”。虽然母亲说上中专最好,时间短可以早挣钱,不能上的话还可回本乡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。我自入小学到初中16岁毕业,作为“田舍郎”时,完全听从命定的安排。

改变命运的作为,真正是从进入福高后开始的,而且是从读书阅报入手的。当时学校重视教学质量,规定学生都要在校住读,只有周日放假一天。从此改变了前一年每日早出晚归,从水部柳宅光脚步行十里路到校上课的习惯。在校住读真有“解放”的感觉,于是放飞自我,尽情地享受读书的快乐,每天在宿舍——教室——阅览室(图书馆)三点一线,循环往复,手不释卷、心无旁骛地

阅读我心爱(心仪)的图书——除了古籍和社科类之外,还有外国名著。如此生活也滋长了我的“贪心”——争取上大学,我不想高中毕业后成年的我,还回老家与没有多少文化的乡人一起,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抢锄挑担。因为我已经自信学业不落人后,而且还有文史及外语方面的优长。当然我心照不宣,毫不张扬,只是默默地埋头读书,内向的性格也成功地掩饰了我的这一心思。

也许是从我的考试成绩中发现了什么,语文、历史老师都特别“关照”我,课堂上遇到其他同学答不上来的问题,老师都频频令我作答。记得一次在校门口偶遇学养深厚的语文老教师,谈到学业时,我恭敬地回答道:“现在正熟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,希望有助于语文科高

考。”他随即答道:“这两本书还好好懂,《庄子》文汪洋恣肆,到大学后,我再跟你一起讨论。”老师不经意的这句话,令我十分感奋,直觉认为他触动了我的“雄心”。当我确定报考北京最高学府的文史专业时,同学们也投来赞许的目光,没见过异词的。我似乎看到了光

明的未来,心里铭记那句古语:“大丈夫志在必得。”

命运转变的机会终于来了。高考金榜那天上午,天气有点阴,我夹把雨伞到校,刚上台阶要向办公楼走去,热心的同学一见到我,便兴奋地说:“美松,你被北大录取了。”我高兴也淡然地回答:“是真

的吗?”但这确实是梦想成真、改命变身的高光时刻。我立即想起以前读的《神童诗》中的一句: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。将相本无种,男儿当自强。”

田舍郎终于中鹄登堂,这是何等自豪啊!当然将相非我所望,发愤改命自强才是正事。如范缜所

说,树花随风漂泊,因无自主之力,故只能随遇而安,七尺男儿有心有力自当有为,转运以易命。所以,那时的我就真切地体会到,勤学力行能改变宿命。前人说“时来天地皆同力,运去英雄不自由”,讲的是人生不可自暴自弃,要抓住机遇创造时运,而机遇又是为有为者准备的。

大学毕业后,我的工作履历也反复证明了命与运的交集会通,业绩与荣誉的获得也同理。

我正式参加工作的第一站,是从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后回北京再分配开始的。当时分到市郊大兴县一个公社的政工组工作,这虽非我的理想,也发挥不了专长,但我认命,仍然愉快办事,尽心工作,经常下乡住村也无怨言。驻村期间,

赶上开展农村“一打三反”运动,我们工作队根据群众反映的解放前地主还乡团问题,收集材料,认真分析,最后派我和同事两人到内蒙古出差,进行调查访问。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,终于查获逃亡的还乡团团长和团长共两人。此事震动了全公社乃至县政府,我也入了党。不久,县委组织部来公社考核干部,随即把我调到县委党校。在大兴县

工作6年之后,我调到福建省财政厅政治处,在厅里工作的十几年间,先是分工落实政策,为100多位干部纠正冤假错案、平反落实政策;后分管财政教育,协助各地财政局创办了宁德、龙岩财校、莆田税校、集美财经中专升格为专科学校,最后创办成人教育的省财会管理干部学院,调任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。

“无心插柳成荫”,本来是新

来后到的我,并无当官升职的奢望,不承想却因工作称职而在机关连续升迁:由科员而副科长、副处长、正处级,当时在哪一级,我都算是最年轻的。越位在许多老同志之前,虽有惭愧但问心无愧,因为靠实干得来,并非讨好、走捷径而得。现在想来,这些层级的升迁实只是为我后来的工作作铺垫。省委组织部考核学院班子时,领导奇

怪我所发表的文史研究文章,提出要调升我升迁到文化部门工作,我自然求之不得。

1994年3月,我奉调来到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,这时已经年届五十,知天命之年归队从事文史研究专业工作,实现了我高考填报志愿时在备注栏中另加的“酷爱文史”的说明,算是遂了我的初心及夙愿。

地方志是“一方之全史”,我的历史学与古汉语知识派上了用场。本人分工负责省级志书中各厅局编修分志和志书的编辑出版工作。这似乎是命数注定的,既是我心仪的专业,也是我的一技之长,所以驾轻就熟,热火朝天地干开了。辅导各厅局修志班子工作,大多数比较顺畅,因而效率也高。同事们配合协调干劲大,人们视为畏途的工作大家却都干得很欢。十年下来,从辅导写作到编辑、出版,直到我离职时,共出版新旧方志、著作、资料、年鉴达198种,而且差错率极小,达到万分之一的标准,因此得到中央地方志指导组颁

导的赞誉和好评。命运随人,天如人愿,同事们协力同心,自然也有本人的十分专注和一份努力。

最后一站还是意想不到的承乏福建省文史研究馆的馆长工作。2004年,我正届花甲之年,却膺此重任,6月份到职,方知前任馆长故去两年,馆务及馆员服务工作亟待加强,由此又开启垂老之年的负重前行。先是安内,协调工作人员和衷共济,调配充实干部,实现满编运作,服务好馆员。嗣即踵继前任,做好文史资料的出版和文史书籍的整理付梓,做到踵事增华。专业人员不足,则聘请与挖掘馆外人才,编制出版计划,申请出版经

费。幸得省政协机关领导大力支持和指导,这也是我们文史使命借助人谋运会之一例。总之,又一个十年下来,在文史馆再编辑出版共110多种地方文史资料和馆员著作。韶华易逝,一晃已届古稀之年,终当告退休致,似此工作到七十周岁的单位主管应属不多。

人云,从业文史者多寿。本馆多耄耋耆寿馆员就是明证。我身体尚健,故虽退休,仍不得赋闲,有爱好,也有使命。当此国家重史兴文之际,各方多需文史人才,我虽绵力薄才,仍有余勇可贾。本着鞠躬尽瘁的精神,我继续从事写作、讲演、编辑、评审、咨询工作,非为

稻粱谋,在献力,不计报酬待遇,只是勉力挽车。眼见当今乐事且胜任文史研究的人才稀缺,老成凋谢,难以为继。靠一己之力帮助手不敷所用,故与同好者谋开“文史沙龙”,以广揽好者、发现能者,聊补不足于百一。

退休以来,忽忽又过十年,如今已届耄岁。桑榆晚景,不任劳矣,唯余初心,正应了晋朝大司马桓温的感叹:“昔年种柳,依依汉南。今看摇落,凄怆江潭。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!”日月逝于上,体貌衰于下,余热不多,芹献有责。命在,运何可止?使命乃是自觉服膺的义务。

回顾来时路,唯余些许雪泥鸿爪,薄材如我,有此也足蒙。命运弄人还自作,田舍郎变身读书郎,读书人还变公务员,公务员再变文化人。一生变化端在命运转圜。田舍本是我的宿命,努力读书,翰运改命,执念初心,使命文史,运之不辍,命运交会,乃得成功。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